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
学术讨论会



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若干问题的思考

周 尚 文

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

1991 年 7 月

内 容 提 要

中国共产党在本世纪20年代初诞生，不是个别人主观臆断的产物，也不是某些偶然因素而造成的“历史的误会”。它是时代的产物和历史的必然。只有放在整个世界历史时代的背景下，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母体中才能找到这个新生儿诞生的历史根据。

中国共产党是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但这一结合有着许多不同于欧美国家的特点。是五四运动的大潮把工人阶级推上政治斗争的舞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被先进的人们紧迫地用来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在反帝反封建大麾下的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特点和优点。

先进知识分子在建党中起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早期共产主义者不是以知识分子的身份，而是以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身份开展党的筹建工作。尽管成立之初的党员成分主要是知识分子，但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了。谁也不会否认，作为一个先进阶级的政治组织，在这一时期内，共产党在中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起着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它决定着中国社会的历史走向，它肩负着改革社会、振兴中华的时代重任，它指引着亿万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灿烂明天。因此，当我们回首70年前在上海一所普通民房里召开中共一大的时候，有必要用新的视角、新的尺度来审视和衡量这次会议的不平常意义，剖析一下推动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国内外条件和根据，挖掘一下党的成立的深层的历史必然性。

近代中国内外条件和共产党的创立

本世纪20年代初，共产党在中国大地上的诞生，不是个别人主观臆想的产物，也不是某些偶然因素而造成的“历史误会”，它是时代的产物和历史的必然，只有放在整个世界历史时代的背景下，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母体中才能找到这个新生儿诞生的历史根据。

首先，时代的潮流推动着中国共产党的创立。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先进国家内资本主义与封建制度之间的矛盾已经解决，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已经确立，相继完成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进入帝国主义阶级。而在东方，在广大亚、非、拉地区，绝大部分国家仍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掠夺，这些国家原有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经济体系已发生很大变化，其中大部份沦为帝国主义压迫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时代的变迁和外国人的入侵，在这些国家里，要出现象17世纪的英国革命、18世纪的法国革命、19世纪的日本明治维新和德国自上而下的统一那样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变革，已经不可能了。不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已经过去，资产阶级已趋于腐朽和没落，这是不可阻挡的世界历史潮流。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资产阶级虽然还有一定的革命要求，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重压下，要依靠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去领导本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往往是不可能的了。

这一点在中国表现得尤为明显。自从鸦片战争国门被打开后，资本主义列强相继入侵中国，中国成了列强各国共同宰割的一块肥肉。“俄北瞰，英西睽，法南隣，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①此种形势下，多少志士仁人为之痛心疾首，对中华民族的沦丧表示深切的忧虑和愤懑。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统治是那样的根深蒂固，支撑它不仅有着遍布广大农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还有渗入亿万人民头脑的封建伦理道德和意识形态，所以，不论是清王朝的封建顽固势力，还是割据一方的反动军阀势力，他们对任何一种革命和变革都惊恐万状，极力加以扼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又相互勾结，于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构成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0世纪以后，在世界范围内，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已经过去，西方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议会制度、以及“自由、平等、博爱”等一整套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已经趋于没落。而在东方，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却方兴未艾，亚洲正在觉醒。在中国，王朝的覆亡，革命的失败，军阀的混战，政治上大一统反动统治宣告结束，给各种西方社会思潮的输入和传播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西方思潮中关于人权、民主、科学、自由等观念在国内广

为流行，竞相传介，给长期封闭的儒家文化猛烈的冲击；思潮依附政派，政派形成政党，各种资产阶级政党政派便陆续登台，五花八门的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方案纷纷推出。遗憾的是，我们这个东方大国的觉醒实在太迟了。中国刚想迈开资产阶级革命的步伐，时代却宣布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在这一时代的巨大落差中，中国资产阶级既不能象欧美国家资产阶级那样在历史舞台上演出威武雄壮的活剧，又不敢坚决发动工人农民起来同封建制度和外国侵略者作斗争。时代的潮流注定它只能扮演悲剧的角色。中国的前途只能寄希望于一个新的阶级——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身上了。

其次，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选择。鸦片战争后，西方的入侵打乱了中国社会前进的固有节拍，暴露了几千年超稳定的封建统治造成的社会停滞、愚昧、孱弱、落后和贫穷。综观鸦片战争后整个近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始终存在着“中国向何处去”的探求和选择。从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励精图治的粗陋思想，到孙中山“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无一不刻上反对外国侵略、变革旧制度的鲜明印记。这种种救国救民的道路和方案的比较和选择，由此而引发的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冲撞，各种政党、政派的兴衰、分化和重新组合，各种思潮之间的比较和论争，都是围绕“中国向何处去”这一轴心转动着的。其中突出的有三次大的浪潮。

太平天国革命是近代中国迈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爆发的一场规模空前的农民革命运动。与历代的农民革命运动相比较，它至少有以下两个特点：其一，它是一场反对封建统治与反对外国殖民侵略初步结合的革命运动；其二，它对近代中国的出路进行了有创见的探索。如果说《天朝田亩制度》仍带有小生产者浓重的空想色彩和平均主义成分的话，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就已越出了农民小生产的狭隘眼光，试图以发展资本主义实业来代替封建宗法经济，寻找中国的新出路，这是过去农民革命运动中从未有过的。当然，太平天国的失败最终表明，尽管借用了西方的上帝，提出了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的设想和政纲，但它终究摆脱不了农民革命战争的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终究未能改变中国的面貌。

如果说太平天国革命只不过是传统农民战争的旗帜上涂抹一些资本主义油彩的话，那末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就已经作为一个正式的资产阶级政派出现在舞台上了。甲午战争的失败，把中国推入民族灾难的深渊，救亡图存成了中华民族的迫切任务。在这种情势下，改良派阵营有所扩展，爱国和革政的呼声日甚，并由此推演出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改革运动——戊戌维新变法运动。维新派人士不同程度上都是受过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他们提出一个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政纲，并以进化论和自由平等学说为思想武器，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有限的挑战。由于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一个政派一股思潮遂演变为一场有声有色的充满悲壮场面的维新变法运动。然而，维新派既不算触犯几千年来封建统治的根基，又无意为普通劳动人民谋求真正的解放，因此，维新派中尽管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那样一批时代“精英”，维新变法运动却始终抛不开皇帝，只能寄希望于开明君主支持下实现变革，结果只能使维新运动昙花一现；另一方面，由于得不到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这场运动始终是一场少数人的改良运动，根本无法改变中国社会的现状，留下的只是无数的遗憾和教训。

维新派企图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来拯救国家改造社会的计划遭到惨败，于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就开始粉墨登场，扮演历史的主角。它的代表人物便是革命民主主义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自1905年成立同盟会，中国资产阶级始建了自己的政党，并在革命党的旗帜下开展自己

的政治活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提出了“三民主义”的政纲，并把推翻清王朝的任务直接付诸行动。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清王朝的覆亡，是中国资产阶级实现其建国理想的一次尝试。革命后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宣布实行“三权分立”体制，颁布《临时约法》，规定各种民主自由权利，等等，无不映衬出仿效欧美资产阶级国家的痕迹。然而，中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陷入困境。其一，当他们决心仿效欧美模式建立共和国的时候，他们发现西方国家远不是尽善尽美的和谐社会。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西方社会的弊端也暴露得日益明显，使孙中山萌生了既要学习和仿效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又企图寻找避免西方社会各种弊端的良方。但这种对策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空想的因素。其二，当革命党人一心一意建设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时候，他们深深感到自身力量的不足。革命阵营内部的严重分化，暴露了资产阶级的动摇和软弱。那些伪装拥护革命的顽固派分子却到处施展诡计，玩弄权术，纵横捭阖，使中国陷入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状态。中国社会因袭的历史包袱也过于沉重，使大部分民众还置身于政治生活之外。这一切，使孙中山感到不断被反动势力所包围和愚弄，处于彷徨和苦闷之中。中国向何处去？辛亥革命仍然没有找到答案。

历史已经证明，在中国，不论近代的农民革命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变法运动，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都没有为苦难落后的中国找到出路。中国要新生，要解放，只能指望一个新的阶级，一个新的政党，一种新的思潮。以五四运动为契机，中国工人阶级独立登上政治舞台，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应运而生，于是，历史的重任落到了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肩上。

再次，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主义运动已得到空前的发展，第二国际所属各国党已拥有“一支统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军”^②，社会主义影响已遍及全世界，以致孙中山也曾试图同第二国际建立联系，并从中汲取社会主义思想^③。然而，在此期间，第二国际内部出现了一股国际性的修正主义、改良主义思潮和派别。修正主义者散布一系列阶级和平、阶级合作的思潮，迷醉于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和民主政治，企图通过改良主义道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应该承认，这股思潮在欧美国家社会民主党内拥有相当大的市场，迷惑了一大批群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十月革命的胜利，宣告了修正主义、改良主义的破产，使右派社会民主党人及其鼓吹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声名狼藉。象中国这样既没有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又没有起码的民主政治可言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种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就无法得到响应和传播。这对中国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是一件幸事。近代中国既然不能按照资本主义方式找到出路，那么，十月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榜样，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朝气蓬勃的革命精神，理所当然地产生巨大的吸引力。陈独秀曾用十分明确的语言说过，社会民主主义“主张利用有产阶级的议会来行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德国社会民主党表面上挂着“马克思派”的招牌，实际上他们“不但忘记了马克斯的学说，并且明明白白反对马克思”，在当今世界上，“只有俄国的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真是马克思主义”^④。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正是从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对比中，从苏俄建立“劳工专政”的实例中，认识到必须“走俄国人的路”，并决心以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在中国酝酿建立新型的共产主义政党。1919年共产国际一成立，就以推进世界革命为己任，对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给予极大的关注和支持，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一股新建共产党的热潮。正是在这股热潮中，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由于得到共产国际派来的使者的具体帮助和指导，只经历短短两年多时间，

就在中国建立了共产党。

总之，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无数先进的中国人艰苦探索和选择，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必不可少的内部条件。时代潮流的推动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则是不可忽视的外部条件。

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历史特点

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无产阶级政党必定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创建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建立其他任何政党的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当然也不例外。然而，在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有着许多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

中国近代工业发展较为迟缓，同机器大生产相联系的产业工人队伍也较幼弱。直至五四前夕，中国产业工人尚不足200万人，这在全中国4亿人口中，工人人数的比例是很小的。但是，产业工人大都集中在沿海省份和大城市，分布在纺织、机器制造、煤矿等大型企业中。这就使中国工人阶级易于形成一股力量，在斗争中发挥独特的作用。中国工人受剥削深重，劳动时间长，工资低微。在工厂里，工人除了受中外资本的剥削以外，还常受到包工头等封建性的超经济剥削。这在世界各国劳工中是罕见的，因此，他们一旦觉醒和组织起来，革命性是很坚强的。

五四运动的火种点燃了工人的爱国主义觉悟。在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的推动下，国内出现前所未有的救亡图存、反对军阀统治、支援学生爱国斗争的热潮。在这样的条件下，上海工人最先觉醒：6月5日以后，在短短几天内，全市10多万工人举行政治大罢工，他们喊出“格政府之心，救灭亡之祸”、“推翻卖国政府”^⑤的响亮口号，表明工人斗争已开始摆脱初期的朦胧状态，具有了初步的独立阶级意识，开始进入自觉斗争的新阶段。上海工人的斗争很快得到全国许多大中城市工人的响应，他们相继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斗争。这一切，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中国工人运动有了新的高涨，然而它的发展还是不平衡的，不成熟的。首先，中国工人阶级中的血统工人成分极少，他们大多来自破产的农民，他们同广大农村有天然的联系，这是优点，但同时他们身上不可避免地保留着小生产者的印记。其次，工人阶级曾长期受到封建行会和其他政派的影响，这些政治势力都试图插手工人运动，控制工人组织作为自己的群众基础，因此，五四时期的工人组织仍比较混杂，觉悟程度参差不齐。再次，由于全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加上交通不便，使工人运动发展很不平衡，相互间也缺乏联系。总的说来，中国工人阶级已有一定数量，工人运动已有一定规模，现代工会已在一些大城市萌生，工人阶级已经独立登上政治舞台。但是，中国工人阶级还很年轻，由于生活困苦，文化水平普遍低下，文盲占绝大多数，加上千百年来封建伦理观念的束缚，工人中的小生产者意识残留较多，缺乏自己解放自己的浓烈的阶级意识，这表明，业已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国工人阶级迫切需要先进的科学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武装它指导它。

早在本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就在中国一些刊物上零星地进行过转载和介绍。由于那时中国还不具备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社会条件，人们并未了解马克思学说的革命实质，因而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也没有产生重大的影响。这种情况在五四前后才有所改变。

首先，原先只是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中国传介过的马克思学说，如今由于俄国革命的胜利而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十月革命不仅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而且在世界上树立了

一个榜样，一个模式。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实例结成一体，给处在内忧外患之中的中国人民面前展示了一条新的道路，去重新考虑自己国家的命运。过去，先进的中国人总是把眼光盯着西方，以法国革命和美国制度为榜样，去寻找中国的出路；现在，人们开始把眼光转到俄国，发觉它更易于被中国模仿和借鉴。李大钊1918年作过俄法革命之比较，蔡和森在新民学会会员通信中也作过俄德革命观不同之研讨^⑥，李达认为中俄两国有相似的国情，因此，“将来中国的革命运动，或者有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的可能性”^⑦。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到俄国革命的深远影响。“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而要走俄国人的路，首先就要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这是五四以后在中国掀起传播马克思主义热潮的重要前提。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原理适用于中国，它为寻找中国的出路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这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的重要原因。在中国，最早得到传播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这些基本原理为中国先进分子提供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原先都是进化论的信仰者，他们都是从确立唯物史观开始，实现自己的世界观转变，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近代中国严酷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决定了人们易于接受和运用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在暗无天日的军阀统治下，陈独秀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揭露了强权政治压迫广大群众的反动实质，提出倒转过来建立劳动专政的任务，主张用革命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⑧。蔡和森更加明确地主张通过“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方法^⑨。既然通过阶级斗争，推翻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是改造中国的唯一出路，合乎逻辑的结论是：要革命，就要首先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正是出于革命的迫切需要，使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专政、政党的原理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一开始就受到广泛的重视和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速度和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在欧美一些国家里，马克思主义传播都经历了一个较长的传介、消化、独立研究的阶段。最初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同时，与各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学说进行激烈的争论。经过长期而艰苦的工作，促使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创建了无产阶级政党。在这些国家里，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第一批共产主义者的出现，到无产阶级政党的创立，一般都要10—20年的时间。而在中国，这一过程仅用了2—3年，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一经传播就被立即应用到实际政治中去，发挥它“改造世界”的巨大作用。但也不能不看到，由于时间短促，缺少一个理论上接受、消化、系统研究的必要阶段。马克思主义传入后，与其他思潮的比较、选择和论争也有，但显得不够充分。紧迫的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不允许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潜心读书和研究理论。他们中间，真正系统地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主要著作的为数甚少，通过独立研究来阐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理论有独创性见解和独特贡献的也极少，多数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通俗解释和普及宣传上，因此，理论水平和理论修养相对比较低下。然而，早期共产主义者一开始就以满腔热情运用自己获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投身于实际的革命斗争，去探求救国救民的真谛，他们自觉地深入到工人中去，进行广泛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并在短时间内促成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这种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在中国，工人阶级独立登上政治舞台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时间都比较晚；马克思

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也比较短促，但中国共产党仍是两者相结合的产物，则是无疑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一开始就注意到群众中去，与“劳工为伍”。这固然与当时盛行的“劳工神圣”的潮流有关，也是他们自觉认识自己的使命的表现。李大钊在五卅前夕写的一篇文章中说：“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和劳工阶级打成一片不可。我甚希望我们中国的青年，认清这个道理。”^⑩

开展“五一节”的纪念活动，举办工人夜校，出版工人通俗读物，组织工会和工人俱乐部，是当时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主要形式。1920年5月，早期共产主义者在上海、北京、广州、长沙、九江、唐山等城市组织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这样大规模地开展纪念劳动节的活动，在中国尚属首次。翌年，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又都有计划地组织“五一节”纪念活动。这些活动促进了工人阶级的觉醒。针对工人群众文化水平低，阶级觉悟不够的状况，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工人中开展了一系列文化启蒙和思想启蒙。上海、广州、长辛店、长沙、武汉等地纷纷创办“劳动补习学校”、“劳工半日学校”、“工人识字班”等，吸引了大批工人。1920年下半年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后，又把创办工人刊物、组织工会作为重要的活动内容。各地小组先后创办了《劳动界》、《劳动音》、《工人周刊》、《劳动与妇女》等通俗刊物，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邵力子等都曾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文章，揭露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实质，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陈独秀等人在上海亲自参加了组建码头工会、机器工会、印刷工会、纺织工会的活动，这批最早由共产主义者帮助建立的工会，以及北方的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济南津浦机器厂工人俱乐部均驰名于国内，开展了有声有色的斗争，发现和培养了一批工人运动的骨干。这一切表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已经有了初步的结合，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尽管这一结合还比较急促和不够成熟。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有一个重要的特点，这就是，两者的结合，不像欧美国家那样基于反对资本主义的共同要求，而是出于反帝反封建、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需要。在欧美国家，工人运动一开始就表现为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斗争，工人谋求自身解放的意识强烈；在中国，是反帝反封建的大潮把工人阶级推上政治斗争的舞台，工人阶级又以坚毅的革命精神和威力壮大了大潮的声势，却把谋求自身解放的要求置于次要的地位。同样，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它代表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为工人阶级解放指明唯一正确的道路。面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也被先进的人们紧迫地用来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而把原有的谋求工人阶级解放的内蕴放在第二位。当然，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的解放和阶级的解放是可以统一的。马克思在巴黎公社期间写道：“只有致力于工人阶级自身的解放才能拯救法国，完成民族事业，因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同时也就是法国复兴的条件。”^⑪由于近代中国民族危机特别深重，民族资产阶级也深受其害，因而具有一定的革命性。于是，马克思的命题在这里变成了“只有首先致力于民族解放事业才是工人阶级自身解放的必要条件”，而要这样做，前提是必须坚持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正确处理这个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具体体现。

可见，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在反帝反封建大麾下的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特点和优点。这样，共产党一诞生，就以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来考虑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以工人阶级的远大眼光和宽广胸怀来制订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终于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当然，这个特点也决定了，在建党以后，亟待进一步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水平和组织程度，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学会在一个农民占人口多

数的东方大国里解决一系列革命的特殊问题。1919年11月，列宁曾对俄国东部各民族共产党人的代表说：“你们面临着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②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就带有东方国家的某些特点。中国共产党建立后，也是在不断探索和解决东方大国所面临的各种特殊问题中成长和成熟起来的。

先进知识分子在建党中的历史地位

先进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起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这是人们所公认的。然而，这里有必要考察一下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

自鸦片战争以后，大批先进的中国人前仆后继，历尽艰辛，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这批先进的中国人，其主体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拥有文化知识，有条件了解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状，有较强的思辨能力，这决定了他们比较敏感，对社会的时弊往往他们最先觉察，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往往他们最为关切，因此，他们身上的忧患意识和励精图治的观念也往往格外深刻。在近代中国，当西方社会思潮纷纷涌入的时候，最早接受和传播各种西方思潮的，也是知识分子。对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口号，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还是很有诱惑力的，以为这是可以用来拯救中国的良方。所以辛亥革命前后，不论是章太炎、邹容等叱咤一时的革命派知识分子，还是陈独秀、胡适、鲁迅那样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仍然踟躅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迷宫中，无法摆脱原有世界观的羁绊，企求从西方哲学和法国、美国的榜样中去寻找中国的出路。无情的现实使他们的幻想不断破灭，于是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不得不深深地陷入彷徨和苦闷之中。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的勃兴，工人阶级人数迅速增长，标志着一个新的劳工阶级的崛起，预示着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将归属这个先进劳工阶级。正在此时，十月革命胜利了，马克思主义连同苏维埃俄国的榜样一起传入了中国，这就给处于彷徨苦闷中的先进知识分子带来了新的希望，使他们获得一种观察中国问题的崭新的观点和方法，他们很快从响往法国革命转而仿效俄国革命，从唯心史观转变为唯物史观，从爱国主义者、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五四运动以后，在很短时间里，新文化运动的阵线发生了分化，一个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出现了。这批早期共产主义者将科学社会主义的火种在劳工中广为传递，终于把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构想很快变成了现实，在中国出现了一场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在五四以后形成的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中，有陈独秀、李大钊那样学识渊博、目光远大、威望很高的思想领袖，他们是这个群体的核心和灵魂。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他们都是英勇的旗手，一直站在国内新思潮的最前列。他们以敏锐的思想，犀利的笔触，揭露殖民帝国主义，抨击封建礼教，反对专制统治。当他们的世界观转变以后，又直接参与了大量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活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争，为党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凭着他们的崇高威望和影响，他们还带领一大批知识青年投身革命运动，他们是一代青年的良师，赢得无数青年知识分子的崇敬和信赖。与此同时，他们还帮助一批挚友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南陈北李”之称，反映了他们被公认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人物。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是一批有敏锐洞察力的年轻学者，他们都出过洋，留过学，

受过良好的教育，因此，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是为了赶时髦，而是出于理性的选择。当他们确立科学社会主义信念以后，便努力著书写文章，深入钻研理论，翻译原著，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作出重要的贡献，这批学者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骨干。来自学校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主要是大学生）是这个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难当头的时刻，青年学生总是热血沸腾，冲锋陷阵，他们思想单纯，头脑敏锐，易于接受新事物和新思潮，在《新青年》等进步刊物的影响下，在李大钊等师长的关心引导下，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成为这一群体中生气勃勃的新生力量。组成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还有毛泽东、恽代英、杨匏安等一批来自地方的或下层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目睹现实社会的黑暗，反动统治的暴虐，人民大众的苦难，强烈的爱国爱民之心和历史责任感，驱使他们去探求各种改造社会的道路，接受当时流行的种种新思潮。只有当那些思潮和方案在实际生活中受挫以后，当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广泛传播以后，他们才找到马克思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这批知识分子注重实际和社会调查，“踏着人生的社会实际说话”^⑬，所以，他们一旦确立了新的世界观，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念尤为坚定，并能更好地结合中国国情，宣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在这个群体中，还有象董必武、林伯渠那样辛亥革命的老战士，他们经历过艰苦曲折的磨炼，对清王朝的黑暗统治，国民之初的军阀混战有深刻的体察，他们追求进步，不甘沉沦，顽强不息地跟着时代潮流前进，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此外，蔡和森、向警予等一批知识分子是在国外通过“猛看猛译”社会主义著作^⑭，接受马克思主义，而成为这一群体中的一员的。总之，五四运动造成社会的大变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又促成知识分子的分化和重新组合。百川汇大海。来自各方的人才组成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这一事实，说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一个科学真理被接受、吸收和被应用于社会实际的客观历史过程。是时代呼唤着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这一群体的出现，又反过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为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成长和世界观转变的道路，就其具体环境和条件来说，虽然因人而异，各不相同，但有两点是共同的：其一，他们原先都曾是有赤诚的爱国主义者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起点。共产主义者首先总是以拯救祖国和人民的危难为己任的。一个人具有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是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十分有利的条件。正是对暗无天日和备受欺欺凌的旧中国所怀的耻辱感和抗争情绪，驱使他们去追求和探索新的真理，寻求一种批判旧世界的武器。其二，当他们原先所信仰和遵循的思想学说，诸如进化论、无政府主义、三民主义、实用主义、工读主义之类思想武器不能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时候，如果他的革命信念没有泯灭，追求真理的意志没有动摇，就必定要去寻找一种新的学说。正在此时，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使他们在彷徨之中获得了新的理想。因此，在他们的脑海里，“破旧立新”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在怀疑、批判旧思想的过程中吸取新思想，又在传播新思想的过程中不断同旧世界观决裂。而这个新思想——科学社会主义是以现代产业工人为阶级基础的，属于无产阶级的科学体系。此刻在中国，现代工人在沿海大城市已显露他们的存在和力量，也显现了他们朦胧的阶级意识，迫切需要科学理论的武装。于是，这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决心“与劳工为伍”的知识分子，就担负起向工人传播和灌输马克思主义的职责，成为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代表。

当先进知识分子转变了世界观，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把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联系起来的时候，他们就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把民族义务和

阶级义务，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民族解放和劳苦大众解放的任务统一了起来。既然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从外部向工人运动灌输，在工人群众中扎根，工人运动的发展也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于是，这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就担负起了将科学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任务。他们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积极投身到工人运动中去，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把自己锻炼成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担负起创建共产党的伟大历史任务。因此，在当时，这批早期共产主义者不是以知识分子的身份，而是以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身份开展党的筹建工作。这也表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党员成分，虽然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但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时候起，它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则是没有疑义的。

注：

- ① 康有为：《强学会叙》，《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5页。
- ② 恩格斯：《“法兰西阶级斗争”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8页。
- ③ 参见《孙中山致社会党国际局函》，《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4～365页；另参见〔法〕马·拉什丽娜：《第二国际和中国革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3辑，1985年人民出版社版。
- ④ 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95、98页。
- ⑤ 《新闻报》1919年6月7日。
- ⑥ 多见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918）；《蔡林彬给毛泽东》（1920）。
- ⑦ 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李任公》，《新青年》第9卷，第1号。
- ⑧ 参见陈独秀：《谈政治》，《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10页。
- ⑨ 《蔡林彬给毛泽东》（1920年9月16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
- ⑩ 李大钊：《青年与农民》，《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48页。
- ⑪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27页。
- ⑫ 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7卷，第323页。
- ⑬ 毛泽东：《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1919年7月），《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63页。
- ⑭ 《蔡林彬给毛泽东》（1920年8月13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